

北宋士风演变的历史考察

郭学信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宋士风演变的历史考察

郭学信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宋士风演变的历史考察 / 郭学信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5161 - 1929 - 7

I. ①北… II. ①郭… III. ①士—研究—中国—北宋
IV. ①D69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798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志兵
责任校对 徐楠
责任印制 李建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5
插 页 2
字 数 230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 选题缘起	(1)
二 学术研究综述	(4)
三 基本思路	(15)
第二章 北宋初期士风的低沉与颓废	(19)
一 引论	(19)
二 因循持重的保守之风	(22)
(一) 因循持重之风概观	(22)
(二) 因循持重之风形成的原因	(28)
(三) 因循持重之风的影响及危害	(36)
三 淡泊功名的隐逸之风	(40)
(一) 隐逸之风概览	(41)
(二) 隐逸之风的时代特征	(45)
(三) 隐逸之风盛行的原因	(52)
(四) 隐逸之风的影响	(58)
四 淡薄名节的颓废之风	(62)
(一) “名节”释义	(62)
(二) 名节意识淡薄的原因	(63)
(三) 名节意识淡薄的表现及评价	(66)

五 余论	(77)
第三章 北宋中期士风的高昂和激扬	(81)
一 引论	(81)
二 历史语境的考察	(85)
(一) 儒学复兴思潮的激荡	(85)
(二) 以“言者之风采”为立国纪纲	(94)
(三) 内忧外患的刺激	(106)
三 慷慨昂扬的士林风貌	(117)
(一) 直言谏论, 奋然敢为	(120)
(二) 关心百事, 忧乐天下	(131)
(三) “以名节相高, 廉耻相尚”	(142)
四 士风昂扬的影响	(159)
(一) 促进了宋代政局的相对稳定和好议论 风气的盛行	(159)
(二) 推动了宋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167)
(三) 开启了北宋文坛经世致用的文学风尚	(173)
五 余论: 党争与随缘自适的士人风貌	(183)
第四章 北宋晚期士风的衰沉与堕落	(195)
一 引论	(195)
二 衰沉与堕落的士林风貌	(203)
(一) 畏于仕进的隐逸风气	(203)
(二) 奔竞务进的无耻行径	(213)
(三) 追欲逐利的道德缺失	(224)
三 历史背景的考察	(230)
(一) 昏君佞臣主导下的黑暗政局	(230)

目 录

(二)崇宁党禁的直接后果	(237)
(三)特定时代背景下多重因素的影响	(244)
四 士风衰沉与堕落的影响	(254)
(一)导致北宋台谏系统独立言事特质发生蜕变 ...	(255)
(二)促使宋代文坛呈现出隐逸与谄媚的病态 风貌	(261)
(三)加速了北宋国势的衰败	(270)
五 余论	(277)
主要参考文献	(284)
后记	(298)

第一章

绪 论

一 选题缘起

“士”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精英阶层，其精神风貌和行为方式，历来与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建设息息相关。《荀子·儒效》中所言“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可谓一语道出了“士”在社会政治和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因此，无论从政治史的角度上讲，还是从文化史抑或社会史的角度上讲，对士风的研究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按照社会认识论原理，一个人的角色是在社会关系中确立的，时代赋予作为社会认识主体的人以特定的社会角色认知。时代环境不同，作为社会认识主体的人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所呈现的精神风貌和行为方式也会打上深刻的时代印记，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如果从历史的长河中对中国古代士人的社会地位进行纵向对比的话，可以认为，有宋一代，士人的境遇和社会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和提高。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是政治权力的垄断者，“上品

无寒门，下品无势族”^①，大多数士人被排斥在政权之外。晚唐五代时期的社会大动荡，虽然沉重打击了腐朽的门阀势力，但这一时期由于藩镇割据，武夫们控制了从上到下的统治权。武人掌权，军阀混战，使大部分文士不仅被排斥在政权之外，而且动辄招致杀戮，人身安全不保，只好在乱世中苟全性命，消极度日，成为冷眼人生和社会的旁观者。

“君臣千载遇”，“寒儒逢景运”^②。历史演进至宋代，随着经济结构的转换，士族门阀政治的崩溃，文化的平民化，教育的普及，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重文抑武政策的实施，以及“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治国方略的确立，士人阶层被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宋代政治社会的主导力量，大批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进入官僚机构，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理想。诚如《宋史·文苑传序》中所说：“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压抑和沉寂了多年的文人因文官治国体制的确立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和优越的历史际遇，文人士大夫也由晚唐五代时期冷眼社会的旁观者而变为宋代关注社会的责任人。

《宋史·陈亮传》有言：“本朝（宋代）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可以说，宋代立国后所实施的“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使宋代文人士大夫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体，这是学界的共识。然而在宋代崇儒重文的政治环境下，宋代士大夫表现出什么样的精神风貌？其对社会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自宋以来却是褒贬不一。褒之者称

①（唐）房玄龄、褚遂良等：《晋书》卷45《刘毅传》。

②（宋）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

“宋之士大夫以节高古人为名”，故“宋之弱而不可亡，实士大夫砥砺名节之效”^①；贬之者谓宋代士大夫“廉耻道丧，风俗不美”^②，或谓“士风益衰，志趣污下”^③。时至当代，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评价不一。

褒贬、评价不一往往是由观照视角的不同决定的，从其各自观照的视角看，无论是褒还是贬，从一定意义上讲，都有其价值所在，也有其存在的合理因素。

而笔者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展开本课题研究的：士风，作为一个时代士人的精神风貌、审美趣味、人格特征和行为观念的外在体现及时代社会心态的折射，由于任何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常常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的特点，因而士风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文化环境及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仅就北宋而论，士风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就存在着很大差异，不可一概而论，而应该给予其阶段性变化的分析研究。拙著正是结合北宋时期不同阶段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北宋初期、中期和晚期^④三个阶段的士风变化进行了具体阐释，探讨论述了三个阶段所呈现出来的主流士风及其形成原因和影响。

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其社会诸多方面皆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受时代变迁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宋代士人阶层的社会地位、精神风貌、人格特征和行为方式皆呈现出许多新的时代特征，对宋代社会及其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对北宋士风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不仅关涉到对

①（清）沈垚：《落帆楼文集》卷4《立名篇》。

②（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59。

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7，元祐二年三月辛巳条。

④ 本书所讲的北宋初期是指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北宋中期是指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晚期是指哲宗、徽宗、钦宗三朝。

北宋文人士大夫精神风貌的认识，而且关涉到对宋代社会文化风貌及宋王朝历史盛衰的把握和认识，同时也有助于人们从一个侧面加深对唐宋之际社会变迁的认识。文人士大夫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社会群体，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又是社会政治的主要实施者和社会管理的主体部分，因此该课题的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古代士人群体的社会功能及其价值，以及知识分子现代价值的再创造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作用。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以《北宋士风演变的历史考察》为题，结合深广的历史文化语境，对北宋士风演变的历史轨迹及原因、每个阶段士风所凸显的内涵特征及其影响进行探析和总结，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北宋士风作出贴近历史真实面貌的认识。

二 学术研究综述

与宋史其他研究领域相比，有关宋代士人阶层的研究长期以来呈现出相对沉寂的局面，但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有关宋代士人阶层的研究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以下仅就有关北宋士风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囿于笔者陋见，难免挂一漏万，敬请专家学者见谅。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涉及北宋士风研究成果的专著主要侧重于文学领域，从文学的角度探讨士风与文学的互动关系。其主要研究成果有：

沈松勤的《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对北宋党争的历史背景与主体精神、北宋党争的理论依据与主体性格、北宋党争的特点与文人和文化的命运、北宋党争与文人的分野、北宋党争与文学创

作的互动等有关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北宋党争及其对士人心态以及文学创作的影响。徐规先生为该书所作的序中对该书的内容、特色有精到的总结和评价，指出该书“以党人融合参政、学术和文学三位于一体的主体性质为主线，考察党争与学术、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三者之间在相互渗透、交互影响中的正面促进与负面效应”，评价该书的特色之一是“观点鲜明，又能发前人所未发之覆”。

萧庆伟的《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年版）一书，也是一部从北宋党争的角度入手，对北宋新旧党争对文学创作影响进行深入专题研究的专著。该书在对北宋党争的文化背景与特征进行整体把握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和总结了北宋党争对士人心态以及文学创作的影响。吴熊和先生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认为，该书的贡献在于“对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的关系做了全面而系统的整体研究，并从作者观察的若干层面进行了有益的剖析”。

张再林的《唐宋士风与词风研究：以白居易苏轼为中心》（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主要以白居易、苏轼为中心，在对唐宋士风与词风进行历史文化阐释的基础上，深入论述了唐至北宋士人人格观念的衍变历程与词风发展的关系，士人的“中隐”文化心态、迁谪心态及其对词的影响，士人对佛道思想的“实用心态”以及士人柔弱的文化心理倾向对词的影响。

刘学斌的《北宋新旧党争与士人政治心态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一书，主要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北宋新旧党争与士人的政治心态进行了深入探讨。该书在对北宋士人政治心态的基本成分、复杂表现，北宋士人政治心态的特点及政治影响，以及北宋士人政治心态与传统政治文化等内容进

行系统分析和深入论述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和论述了北宋士人群体的政治心态对该群体政治行为的影响以及产生的政治后果。

李强的《北宋庆历士风与文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在对政治文化视野中的“庆历之际”进行分析论述的基础上，以北宋庆历年间出现的《庆历圣德诗》以及发生的“争水洛城事”、“进奏院狱”等重大政治事件为考察对象，分析研究了庆历士风的嬗变轨迹，对北宋庆历士风与庆历文学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和总结。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表于各类刊物的有关北宋士风研究的学术论文比较丰富，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宽泛。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例如，毛元佑的《宋初文武臣僚处世态度之心理分析》（《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对宋初40年即太祖、太宗朝文臣武僚的处世态度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颇为深入细致的考察和比较。邓小南的《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载《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文，认为北宋初年，执政的文臣们虽然往往以进士起家，但多数精通吏道，具备丰富的基层实践经验，他们更为关心的是社会现实而反感于浮泛的高谈阔论；他们中的多数以镇重勤勉著称。该文虽然主要是就10世纪前中期（唐末五代时期）文臣群体内各类人物能力素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探讨，但正如文中注释所说的那样，“自唐朝末年轻五代至北宋初年，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面临的社会矛盾性质类似，统治者在挣扎摸索中致力于解决的问题类似，这段期间事实上属于同一单元”，从这一角度而言，该文对于我们分析、把握宋初士人群体的文化人格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马茂军的《论宋初百年士风的

演进》（《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一文，对宋初到仁宗庆历年间士风的演进过程进行了概括性的论述，指出宋初百年士风演进的过程，是宋代儒学复兴的过程，是道德逐步振兴、士风由颓废消沉逐步走向高昂的过程；是节义观严重缺失到逐步道德化的过程，是从人格委琐逐步过渡到以风节自励、以名节相高的过程。张邦炜的《论北宋晚期的士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一文，主要对北宋晚期的士风作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认为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堕落甚而至于无耻，不仅隐逸与奔竞之风盛行，而且形成了好官当中无好人、最高统治集团由昏君加佞幸组成的格局。该文还分析了北宋晚期士大夫阶层堕落的原因在于其自身具有劣根性与软弱性，其根源在于其理念与追求并无深厚的经济基础作保障。刘兴亮的《北宋士风之异动》（《山西师大学报》2011年第1期）、《仁宗朝士人群与北宋中期士风的转变》（《船山学刊》2011年第3期），前文从北宋时期这一相对宽泛的视野出发，对北宋时期士风异动表现出的奔竞、隐逸、政争、奢靡之风作了深入论述；后文则以仁宗天圣年间、明道至康定年间、庆历年间、皇祐至嘉祐年间的士人群体为具体研究对象，探讨了北宋中期士风的转变，指出北宋中期士风的转变更多的与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群体自觉有关。梁建国的《北宋东京的士人拜谒——兼论门生关系的生成》（《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和《北宋东京的社会变迁与士人交游——以宋徽宗时代为参照的考察》（《南都学坛》2010年第3期）二文，前文认为，随着宋代“科举改革措施的颁行，考前的行卷基本消歇。东京城内名宗宿儒云集，士子热衷于投献赘文，拜访名师，并以‘门生’或‘门下士’自居。荐举法是宋代任官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入仕之后，通过荐举得以升迁是官员最为关心的要

事，故而奔走权门以求举荐遂成为他们热衷的活动，被举者对举主也自称“门生”；后文则以宋徽宗时代作为参照，对东京城在北宋时期的社会变迁及其与士人活动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考察和论述，指出徽宗一朝，虽然士人在东京的活动时间和空间都更加自由，但由于受党锢之祸和政治高压等因素的影响，东京士人的日常交游活动却呈现出沉寂的状态。张学玲的《北宋士大夫及士大夫政治》（《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一文，则对北宋士大夫在宋代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历史环境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精神风貌进行了深入论述。李同乐、母丽娜的《论宋初士大夫的角色回归》（《岱宗学刊》2009年第3期）一文，在对五代士大夫的“吏能化”与官员—学者二重身份的分离进行论述的基础上，探讨了宋初士大夫官员与学者二重角色的回归，并由此论述了宋代士大夫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及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在历史上的影响。陈峰的《政治选择与宋代文官士大夫的政治角色——以宋朝治国方略及处理文武关系方面探究为中心》（《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和《宋朝的治国方略与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史学集刊》2006年第1期）二文，从北宋统治者在政治上对士大夫阶层的选择以及采取的相关治国方略的论述入手，就北宋士大夫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角色进行了深入论述，认为宋代士大夫群体政治主体地位的不断提高，使得宋代的文官士大夫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影响力。陈峰、张瑾的《吕夷简与北宋中叶的政风》（《西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一文，探讨了吕夷简从政后所表现出的由直言敢为向因循保守转变的从政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并对其从政特点对北宋中叶政风产生的消极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张启容、吴雯、唐希鹏的《试述北宋政风的

演变》（《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一文，则结合民国时期学者刘咸炘在《史学述林·北宋政变考》中的有关论述，对北宋时期政风的变化及其在不同时期所呈现出的不同形态进行了阐释。吕变庭的《北宋士大夫的人格特征》（《北方论丛》2005年第2期），主要从宏观角度系统剖析了北宋士大夫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的角色转换和人格独立问题，对北宋士大夫从边缘到核心的政治人格、从悲观到自信的文化人格、从观望到责任的社会人格进行了深入探析。易小平《试论北宋文人的性格矛盾》（《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一文，则对北宋文人济民与忠君、达己与达人、欲与理的人格矛盾及其平衡这种矛盾的方法进行了论述。丁娟的《从士风看北宋后期士大夫的闲暇生活》（《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一文，由士风入手，对北宋文人士大夫热爱旅游、寄情山水、耽佛习禅、酷爱禅诗等方面的闲暇生活进行了探讨。

从文学的角度入手，探讨宋代士风与文学的互动，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李强的《北宋“诗文干政”与士风——以仁宗庆历之际为中心》（《东岳论丛》2008年第2期）一文，以北宋庆历之际为研究时段，对北宋庆历之际“诗文干政”与士风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论述，指出庆历之际“干政”文学的产生和兴盛与士人所处的政治环境以及士风的张扬有很大关系，认为北宋“诗文干政”虽然是文人政治文化高度发展和士风张扬的结果，但也可能出现以文人意气代替行政理性，以道德评判代替政治是非的做法，从而成为影响士风丕变、颠覆和谐文人社会的重要因子。周剑之的《“以天下为己任”诗风之开启——北宋景祐三年朋党事件中的诗歌写作及其诗歌史意义》（《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1期）一文，

对北宋景祐三年朋党事件中的诗歌写作的基本情况，以及诗歌写作的内在动因与精神内涵进行了系统探析和深入论述，认为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理念，“一方面从整体上复苏了诗歌中的政治讽喻精神，形成了以诗讽喻、以诗议政的趋势，另一方面又促使诗人以超脱的姿态面对仕途起伏，为贬谪诗歌带来了积极达观的面貌，从而将诗歌正式引上了庆历诗风的轨道，并深刻影响着后来诗人的写作”。李春青的《北宋士人的政治诉求及其文学映象》（《河北学刊》2008年第2期）一文，则主要探讨了北宋士人的政治诉求及其衍化形式，并就北宋士人政治诉求对思想学术与文学观念的影响进行了深入论述。曾祥波的《论北宋前期诗文的议论风气》（《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与秦寰明的《试论北宋仁宗朝前期的士风与文风》（《东方文化》1995年第1期）二文，也分别就北宋前期和仁宗朝前期的士风与文风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王祥《试论柳开的古文古道与宋初士风》（《北方论丛》2004年第1期），从文学的视角，以柳开为个案，论述了柳开的“文道观”在北宋士人人格的净化和提升方面的地位与作用，认为由柳开始，士人的名节、操守逐渐引起北宋士人的普遍关注，士人人格理想也得以净化和提升。

范仲淹是开宋代新士风的关键人物，因而长期以来，关于范仲淹的人格特征及其在北宋士风转变中的作用一直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刘子健的《范仲淹梅尧臣与北宋政争中的士风》（《东方学》1957年第14期），以范仲淹、梅尧臣为个案，对北宋政争中的士风进行了探讨。刘经华的《范仲淹与宋代士风》（《江汉论坛》1990年第1期）、诸葛忆兵的《范仲淹与北宋士风演变》（刘道兴、杨德堂主编《范仲淹文化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主要深入

探讨了范仲淹的名节思想、“修身”的品德追求与实践及其在宋代士大夫中间的影响，对范仲淹在北宋士风转变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予以充分肯定。王瑞来的《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论——以范仲淹为中心的考察》（《宋史研究论丛》第6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文，以范仲淹个案研究为对象，对范仲淹所体现出来的报恩论、爱名论、忧患论、进言论、皇权论等五个方面的立言行事进行了深入论述。文中指出之所以从这五个方面评论范仲淹，“不仅是想揭示范仲淹诸多事功的精神原动力，而且更想通过对范仲淹的精神世界的分析，由一斑窥全豹，来探索一下有宋一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因为，以上所列举的范仲淹的五个方面，正是宋代绝大多数士大夫皆具有的共性特征与思想主流”。杨世利的《范仲淹与宋代士人的政治主体意识》（刘道兴、杨德堂主编《范仲淹文化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一文，主要以范仲淹为中心，就宋代士人政治主体意识的表现及其局限性进行了深入论述。何忠礼的《略论宋代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以范仲淹等人的政治活动为中心》（《杭州研究》2010年第2期），通过对范仲淹为首的一大批士大夫政治活动的考察，对宋代士大夫空前高涨的参政议政积极性进行了论述，指出宋代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已经走出了汉唐时期统治者“牧民”的范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文章还对宋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有利因素和条件从三个层面进行了总结论述。张希清的《范仲淹与富弼关系考》（《中州学刊》2010年第3期）一文，对范仲淹与富弼相交近三十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考述，认为二人终其一生，以天下为己任，忠君报国，他们一生的交往，既是亦师亦友亦同僚的“忘年神交”，又是中国古代文人政治家实践“和而不同”政治理想的典范。唐玲的